

外债 两重性

——引敬手 桢桢

● 隆武华 著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外 债 两 重 性

——引擎？桎梏？

隆 武 华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F012.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隆武华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11

（财经博士论丛）

ISBN 7-5005-4886-9

I. 外… II. 隆… III. 外债-研究 IV. F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7547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e.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邮政编码：100010

发行处电话：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16.625印张 390 000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25.00元

ISBN 7-5005-4886-9/F·438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简 历

隆武华，男，1964年11月生于湖南省衡阳县。1982年9月~1989年7月，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在校期间，对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有较多研究，曾发表《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与传统观点的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等论文。1989年7月~1998年3月，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外债、现实财经问题的研究工作，与许毅教授、金普森教授等合著《清代外债史论》一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1993年9月考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1996年8月毕业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外债论》被评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优秀论文。1996年4月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和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1998年3月调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目前为政策研究室国内调研处处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序 言 一

许 毅

外债，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通过殖民战争而发展，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繁荣起来的一种国际金融业务。它从一开始起，就扮演了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殖民地财政经济命脉的主要角色，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外债也为发展中国家扩大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外债的这种二重性，从外债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由此，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外债理论：西方的外债理论，是从债权国——主要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角度，以如何提高外债对债务国的控制、保证外债的偿还性、安全性为主要目标，同时，为了推销他们的外债，加快发达国家对外输出资本的进程，他们还建立起了一整套以外债有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通过过份强调外债对债务国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来掩盖其外债对债务国的掠夺和剥削本质。以这些理论为先锋，资本帝国主义成功地完成了国际金融全球化的过程，通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美元”外债、到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最后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对外债的起源、本质、作用等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外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海外贸

易、殖民战争是外债产生的温床；外债具有生息资本的独特性质，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外债作为国际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矛盾运动；等等。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正确把握外债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外债始于鸦片战争后的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随着资本主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产生的。从总体上讲，近代中国的外债既是资本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又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客观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引进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利用这些“外债”，建成了156项重点项目，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了我国利用外资、举借外债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理论的外债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外债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回顾我国短短的外债史，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外债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它既给中国带来了耻辱，也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的进入，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外债危机、90年代后期的金融风暴，我国对外债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升温。我国学者在吸收国外外债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实践，对我国的外债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财政部科研所从80年代初期起，就从中国外债的起源、本质、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隆武华同志1989年

从历史专业毕业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后，就参加了我所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他从广义财政学的角度，在总结前人对外债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系统地对我国的外债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中国即将加入 WTO 的时候出版这本书，十分及时。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在新世纪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中，更好地做好外债工作，发展我国的外债理论，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0 年 9 月于北京

序 言 二

王 传 纶

本书作者隆武华同志本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多年来，他在财政学界前辈许毅教授指导下从事中国近代外债研究，成绩斐然。他的博士论文《外债两重性——引擎？桎梏？》经修改后即将付梓。承他好意，邀我写一个短序。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外债具有两重性。作者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个主题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外债是国际生息资本的流动这个事实，提出外债的两重性是由于信用的两重性，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因其内在的虚拟性而影响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也从不少国家的历史来阐述外债在资本原始积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中曾起过巨大作用。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输出的作用分析，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实际情况的。本书作者勇敢地肯定这个论断，也指出必须区分国际间平等互惠互补的资本流动与霸权主义国家利用金融实力欺压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理论上说明外债是有两重性的。

西方经济学对外债的经济作用也并非都是肯定的。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

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盛行的发展经济学，曾把外债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从现实的发展中也不得不承认外债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被迫依附于债权国而落入债务陷阱。西方经济学中对外债作用的评述，未必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相一致，但有一点仍是共同的，即他们也承认外债的两重性。

作者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花了功夫，但并未忽略有关外债的现实问题。作者从国际金融组织当前实行的方针、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国际金融的深化和创新、国际游资和金融投机、债务清偿困难和债务重组等现实问题，说明外债确实具有两重性。

我受作者的启发，也愿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对外债（或利用外债）的两重性的粗浅认识，分条说明如下：

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商品的全部价值是劳动所创造的，不是资本所创造的。外国资本——无论是直接投入的生产资本还是借入的生息资本即外债——都不创造价值。

2. 但是，资本——包括外资和外债都可以增强劳动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3. 资本（包括外资）的投入和运用，可以扩大剩余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的份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尽量地占有这个份额，这是剥削的实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一定历史时期迅速发展、而在随后的历史时期陷入重重困难的根本原因。

4.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剩余产品的价值仍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源泉。扩大剩余产品的价值，不是剥削劳动者，因为这部分产品的价值不属于资本家所有，而是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这个区别是本质性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的区别。

5. 社会主义国家引进外资，借进外债，有可能带进一些硬件和软件，可以作为生产投入品。由于这种投入，劳动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剩余产品价值也随之可以扩大。这是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要引进外资的主要原因。

6. 外资，无论是直接投入的股权资本还是债权资本，既是资本，必然要求在剩余产品的价值中占有一定份额。这个份额是不劳而获的，决不是某种服务的报酬。随着外资而引进的硬件和软件都是有偿的，已按照它们的市场价格补偿了全部价值。外国人的股权或债权要在剩余产品价值中分取一个份额，是无偿的占有。但从外资的引进方看，又是不能避免的。

7. 外资（或外债）的两重性，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它有可能扩大社会产品总价值中剩余产品价值的份额；另一方面，它必然要在剩余产品价值中分取一定份额。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但并不对称：前者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后者通常是不可避免的。

8. 对外资（或外债）两重性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它涉及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区别。按照后一种理论观点，在社会生产函数中，资本是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变量；在其他一切要素都不变的假设下，资本增量与产值增量的比率就可以界定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如此推论下去可以推算出资本对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外资对本国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贡献”和“贡献率”本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专用词，有

其特定含义和具体的计算方式。但如今已进入我们的经济论著和出版物中，被认为是外资应该得到社会总价值一部分的根据。这实际上否定了外资的两重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

9. 对外资（外债）两重性的认识，足以纠正两种片面性。当人们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感到自豪的时候，实际上忽视了外资曾经促进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事实。当人们困于资金缺乏而外资拥入使厂房高楼林立的时候，又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外资的“贡献”。这两种片面性，都不符合现实。

10. 对外债两重性的正确认识，使受资方对外国投资者可以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外资所追求的收益并没有什么上限，主观上要求越大越好。但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高限。外资追求的收益是有下限的，那就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可比的市场收益率。在上下限之间，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是起作用的。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是合并计算的。高风险必须有高收益作为补偿。受资方不能把政策的立足点放在只接受所谓“软贷款”上，也不能把政策措施主要放在各种优惠待遇如减免税负、优待土地使用或雇用劳动者的条件上。正确的对策是切实改进投资环境，从而降低外资的风险预期。实施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企业及其产品或外资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既不歧视和差别待遇，也不另外优待。这可以降低外国投资者的风险预期，从而有可能压低他们索取的条件。

11. 对外债两重性的认识，也是受资方政府对外债的宏观管理和企业的微观管理各项具体措施的指导思想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种种论述，本书作者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就无须多言了。

在结束这篇短序的时候，我愿意再说两点。一是对上面提出的那些个人的想法，请多加批评。二是对本书作者和其他的中青

年经济学者，期望他们作出更多的贡献。

2000 年 9 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外债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本书力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外债的全貌，但志大才疏，深感力不从心。为此，笔者始终抓住这样一个中心：那就是外债的两重性，一切问题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因此，本书在选材上，确立了两个原则。

第一，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着重把握外债运行的历史规律性。外债已有几百年的演变，研究外债问题，如果对其历史演变视而不见，就只能从表面现象出发，看不到外债的本质和演变的规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研究经济问题不能脱离历史。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曾明确表示：“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十分精辟的论述。如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金融学家金德尔伯格就说过：“历史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本身就值得探讨，因为它的过去在那里。但是，一个从现代经济角度去研究历史的人会不可抗拒地发现，历史上类似的

事情和先例对目前的重要争端有影响”。当然，就历史而历史又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一点上，受我国乾嘉学派的影响，我国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只重视史料的搜集，忽视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律性的探索，这是需要着力加以改正的。

第二，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围绕着外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来阐述问题。这样说，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首先，从外债的研究现状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债问题的研究远甚于发展中国家，他们从发展经济学的原则出发，试图提出一些可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发达国家决策的问题来。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大多生活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是十分清楚，再加上他们的立场问题，因此尽管他们当中不乏其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得出的结论难免有隔靴搔痒给人以不痛不痒之感。其次，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当中，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国策，大胆利用外资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全新的事业。如何做到外债的借、用、还三个环节的有机统一，趋利避害，走一条富有成效的借外债以发展经济的健康之路，已成为我国外债理论与实践中的当务之急。为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实践，尽可能找出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规律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外债理论中国化，使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并力图建立一种理论体系。

根据这一总体设想，本书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债务理论，通过对古今中外外债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与总结，通过对外债的本质、外债的两重性和债务危机的剖析，通过对外债与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关系的分析，最终把外债问题归根于生产力是否发展的问题，归根于国家通过财政手段从要素配置调

整产业结构的问题，归根于政治上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从而从总体上把握外债运动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着手对中国的外债问题进行一些阐述。

具体说来，本书拟分为十三章，每章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雾里看花说外债。对外债进行界定，搞清楚外债的内涵与外延，是进一步研究外债的基本前提。笔者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即最狭义外债、狭义外债、广义外债、最广义外债。这四个概念，一个比一个范围大，前两者构成内涵外债，我把它称为外债；后两者构成外延外债，我把它称为准外债。最狭义的外债，即最核心意义上的外债，又称国家外债或国外公债或公共外债，是政府通过借贷、债券等形式或由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的对外国的债务。它直接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债。狭义的外债，是指一国居民欠非居民的债务。广义的外债包括一个国家的外贸逆差。最广义的外债，包括外国对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和一个国家银行的外国分行在国外吸收的存款等。广义外债是一种潜在的外债，更是风险性较大的外债，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同时，外债又是信用的一种转化形式。要把握外债，还必须追溯到信用的起源与转化，从而使我们对外债产生的历史条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牢记，生产力的发展是外债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海外贸易、殖民战争是外债产生的温床。

第二章，外债两重性：马克思如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外债两重性理论，是新时期建立外债理论的基石。过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外债理论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总结，本章在系统阅读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有关国债、外债、信用以及殖民地理论等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抽象与概括。笔者深深地为马克思的一些精辟论断所感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外债的起源、本质

以及影响等问题作出了科学分析，诸如：外债具有生息资本的独特性质，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外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矛盾运动等等。这些见解，集中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外债的两重性。它对于本文的写作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正确把握外债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引擎？桎梏？西方经济学家各执一词。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外债经济作用有许多论述，对外债是“引擎”还是“桎梏”，争论颇大。发展经济学家视外债为引擎，认为外债可以打破贫困，外债是起飞的社会先行资本的组成部分，外债可以弥补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缺口等。而债务桎梏论者则坚持道：由于资本的剥削性，举借外债只会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奇迹和已经失败的起飞”。本章对这一争论进行了解剖和评判。

第四章，世界外债的演变与历史昭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笔者觉得要科学地回答外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桎梏”这个问题，除了前两章的理论阐述外，还必须进一步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寻找其演变的轨迹。通过对世界外债发展六大阶段的划分与考察，世界经济对外债的历史昭示至少可以表述为以下四个方面：外债是世界各个国家赖以发展的一个条件；外债既应贸易之需，又充战争之用；基础设施的开发与被控制共存；经济奇迹与债务危机相伴而行。

第五章，外债与政治、军事、财政、经济诸关系论。外债问题无疑是财政问题，但就债论债、就财政论财政则是没有出路的。这是笔者1989年以来受许毅教授广义财政学影响所体会最深的。因此，本章决意要把外债放入社会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大背景下，从宏观的大角度来阐述外债与政治、军事、财

政、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剖析外债问题由财政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的原因，剖析国家财政对外债的引导作用以及外债对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巨大反作用。

第六章，外债、内债和直接投资——筹资方式的分析与比较。外债、内债与直接投资作为一种筹资方式，各有优势各有弱点。本章力图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通过对它们协调配套、优劣主从及互为补充关系的分析与比较，提出了内债为主外债为辅、外债为主直接投资为辅、外债引导直接投资等观点，这些看法能否成立，有待于各位读者的批评和匡正，更有待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检验。

第七章，利用、控制、管理——外债良性循环三部曲。在当今阶级社会，由于资本的存在，发展中国家举借外债决不是简单的借债还钱，而是深深地渗透资本的驱利性和资本所有者的政治经济控制企图的。对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心中有数，切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并在实际行动中集体行动，为维护主权与独立，为营造比较好的借债环境而斗争，共同走好利用、控制、管理这个举借外债的三部曲，从而为集中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解除国内的瓶颈、缺口与科技教育滞后的制约而筹集到更多的更优惠的资金，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

第八章，中国近代外国对华投资与掠夺。西方列强对华投资，既是影响近代中国财政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又是反映资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侧面，更是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外债问题的基本前提。本章描绘了1840~1949年西方列强对华投资的基本脉络，深入考察其投资的国别、地区和投向结构。在如何评价西方列强对华投资的问题上，笔者力主应把握两个方面，注意辩证法。一是要看到西方列强在华企业“白手起家”的性质，以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制和对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控制；